

康南海教育文選

叠嶂雲嵐

周德昌編



松杉樓閣擁經烟鳥

啼花放山池曉
草芊芊

芳草可曼眠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康有为像

南海县康有为博物馆供稿

本书承蒙南海县康有为研究所资助出版

前 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与洪秀全、严复、孙中山等一样，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他是中国资产阶级诞生以后最早出现的杰出的政治代表。他一生满怀爱国激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他大声疾呼变法，呼吁社会改革，谋求救亡图强的治国之道，艰难跋涉在“山河已割国抢攘”的历史途程之中。虽然，他所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仅仅是昙花一现，失败了；他上下求索，竭思殚虑，构想一个把中国引向近代化的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蓝图，由于不符合历史潮流，也被历史的浪涛所淘汰，并终于在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悲剧地结束了他的一生。但是康有为的历史功绩，并不在于变法本身的成败得失，而在于他以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的历史眼光和过人的胆识，透过历史的重重苦雾，看到了延续几千年的、被封建统治者神化了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的历史必然，勇敢地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思想，石破天惊地提出了用资产阶级民主政制代替封建政制的救国主张。这无疑是一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它像春雷的巨响，震撼着“万马齐喑”的封建古国，也使“山河尺寸堪伤痛”，“贾生痛哭欲如何”的爱国志士，看到了救国的曙光。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康有为不仅是一位政治维新的领袖，而且是一位学贯中西，杂糅经史，勇敢地向封建传统思想、传统观念、传统文化猛烈开

火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启蒙了一个时代人们积淀的封建思想和意识观念，开拓了一个时代新的思想风尚。同时康有为政治上的失败，思想上沉重的传统的封建文化的积淀，也不完全是属于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近代这个民族灾难的时代的产物。从康有为一生的思想、文化素养和生活情趣，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爱国者的救国热忱，不甘屈辱的中国人的尊严和自信，也体现了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中开始觉醒，上下求索而又不能真心掌握历史的巨轮，找到能医治沉疴的“神方大药”的爱国者的彷徨、困惑和固执，甚至不谙世情的迂腐。康有为也正是以他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启迪着后来的革命者，起到一个资产阶级改革的先驱者的积极的启迪作用。

康有为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他的思想带有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特点、素质，影响波及东南亚一带。而他十六年的海外流亡，游历了三十二个国家的经历，使他有与各国政治家、思想家和人民群众广交朋友，切磋学问，成为一个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而国外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使他有考察各国的政制风情，接受西方最新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科技思想等等的熏陶，触发了他思想上的变化，康有为后期经济思想、科技思想、美学思想和人才思想的发展，就表现了他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上的飞跃，带有鲜明的属于世界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时代色彩。

广东是康有为的故乡，广东人民为本省出了康有为这位世界历史名人而感到自豪。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后来，对康有为广东也像全国一样，未能给予他实事求是的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研究终于随着政治上的变化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研究康有为思想的论著相继发表，一个重新评价康有为的热潮，在广东，也在全国正方兴未艾。今年，是康有为诞生130周

年，也是维新变法9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曾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民主和富强作出贡献的人物，华南师范大学岭南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将康有为研究列为重点科研课题，并在南海县的支持下，决定成立康有为论著与研究丛书编委会，负责编撰康有为论著和研究丛书，计划在近几年内陆续出版如下著作：《康有为思想研究》、《康有为哲学思想研究》、《康南海教育文选》、《康南海诗文选》、《康南海政史文选》、《康南海哲学文选》、《康南海经济、科技文选》和《康有为著述编年目录与研究资料分类索引》等。参加这套丛书编著的包括历史、哲学、教育、文学、经济等学科的同志，我们试图通过学科的横向交叉研究和合作，吸取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康有为的最新成果和新发现的史料，深化对康有为思想的认识，展拓多层次的思想研究，给予康有为一个历史的公允的评价，也为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教训。

当《康有为论著与研究丛书》陆续出版之际，恳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

曾近义

钟贤培

一九八八年二月

目 录

前言	(1)
与洪给事右臣论中西异学书(1888年)	(1)
长兴学记(节录, 1891年)	(4)
附录: 康有为记万木草堂	
梁启超《三十自述》	
梁启超记万木草堂的教学	
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	
卢湘文《万木草堂忆旧》	
桂学答问(节录, 1894年)	(26)
殷试策(1895年)	(28)
上清帝第二书(节录, 1895年)	(32)
上清帝第四书(节录, 1895年)	(35)
上海强学会序(1895年)	(38)
附录: 上海强学会章程(1895年)	
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附会章, 1897年)	(44)
请厘定文体折(代杨深秀拟, 1898年)	(48)
请派游学日本折(代杨深秀拟, 1898年)	(51)
请派近支王公游历折(代杨深秀拟, 1898年)	(53)
请开局译日本书折(代杨深秀拟, 1898年)	(55)
请明定国是疏(代徐致靖拟, 1898年)	(57)
请改八股为策论折(代宋伯鲁拟, 1898年)	(60)

请催举经济特科片(代宋伯鲁拟, 1898年)	(63)
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1898年)	(64)
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兵校折(1898年)	(69)
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代徐致靖拟, 1898年)	(73)
请厉工艺奖创新折(1898年)	(76)
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 策论折(1898年)	(80)
请废八股勿为所摇片(代宋伯鲁拟, 1898年)	(82)
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1898年)	(84)
请开学校折(1898年)	(88)
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1898年)	(91)
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以一风气而育人 才折(代徐致靖拟, 1898年)	(95)
请禁妇女裹足折(1898年)	(98)
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1898年)	(101)
域多利义学记(1899年)	(103)
大同书(《去家界为天民》节录, 1902年)	(105)
物质救国论(节录, 1905年)	(116)
孔教会序一(1912年)	(125)
中国学会报题词(1913年)	(128)
复教育部书(1913年)	(134)
中国还魂论(1913年)	(141)
在浙江之演说(1916年)	(147)
在宁垣学界演说(1916年)	(149)
镇江政学两界欢迎会演说(1916)	(151)
请诛国贼救学生电(1919)	(154)
陕西第二次讲演(1923)	(157)

与洪给事右臣论中西异学书

(1888年)

承示洒洒数千言，驳诘洋人政事制度，深斥洋学者之非，而发明我先王及祖宗之大法，及中西强弱之故，远虑深识，侧服无已。然所驳诘者，于洋人情事利弊，似未甚得其槩肯，既未足以折西人，亦不能服讲洋学者之心，则虽有正论，彼亦将哂笑而不肯相从也。仆近者涉猎于洋学，反复中西相异之故，及其所以强弱之效，亦似稍得一二。仆，深山之人也，幼奉儒师之训，诵先圣之书，未尝识一洋人，未尝与一洋事，其无所偏袒，可不待言也。谨复于太君子之前，惟垂采而教正之。

窃见近人言洋学者，尊之如帝天；鄙洋事者，斥之为夷狄。仆以为皆未尝深求其故者矣。夫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一曰势、一曰俗，二者既异，不能复以中国之是非绳之也。何谓势异？中国自三代以来，为一统之国，地既广邈，君亦日尊，以一君核万里之地，□□□□长驾远驭，势有所限，其为法也守，其为治也疏，听民之自治，然亦幸赖其疏且守，若变且密，则百弊丛生矣。泰西自罗马之后，散为列国争雄竞长，地小则精神易及，争雄则有愤心，君虚己而下士，士尚气而竞功，下情近而易达，法变而日新，此势之绝异也。中国义理，先立三纲，君尊臣卑，男尊女卑，□□□□□□□□□□□□，故君尊有其国，男兼数女。泰西则是异，君既多则师道大行而教皇统焉，故其纪元用师

蒙祖父之荫，而悖祖父之学行，则不如自食，邻人反得以其学行挺起，名其先世出身卑贱，反为之屈矣。故仆所欲复者，三代两汉之美政，以力追祖考之彝训，而邻人之有专门之学，高异之行，合乎吾祖考者，吾亦不能不折取之也。

公谓西国之人专而巧，中国之人渎而钝，此则大不然也。我中人聪敏，为地球之冠，泰西人亦亟推之。自墨子已知光学重学之法，张衡之为浑仪，祖暅之之为机船，何敬容之为行城，顺帝之为自鸣钟，凡西人所号奇技者，我中人千数百年皆已有之。泰西各艺，皆起于百余年来，其不及我中人明矣。然而泰西特以器艺震天下者，其所以鼓舞之异也。其君、大夫相与鼓励之，其士相与聚谋之，器备资足，安得而不精。我聪明之士，则为诗文无用之学，以其愚者为之，而有精巧者，又未尝鼓励也，则安能致巧，是盖政教之异，不得归咎于中人之渎且钝也。

〔说明〕

本文录自《救时刍言》。1879年后，康有为开始陆续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和当时正在酝酿着的改良主义思潮，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

在给洪右臣的这封信中，康有为较早谈到对“中学”与“西学”的评价问题。虽然有些看法不及后来那么成熟和具体，但已经表现出了他的卓越见解。他指出，“近人言洋学者，尊之如帝天；鄙洋事者，斥之为夷狄”，这都是片面的，都是由于对“西学”没有深入的了解。二者的国情、习俗不同，我们不能以“中国之是非绳之”。例如，中国实行封建专制制度，“以一君而统万里”，而西方则实行议会民主，“政事皆出于议院……一切与民共之”。我们应该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康有为说，这是他近年来“涉猎于洋学，反复中西相异之故”的心得体会。这种用比较的眼光来考察中西文化教育的差异，在当时不仅是新鲜的，而且是深刻的。

长 兴 学 记 (节录)

(1891年)

鄙人蠢愚，文质无底，虽尝钻励，粗知记诵，非能知学也。二三子以蹶蹕之志，斐然之资，荡涤汗泽，嗟肯来游，鄙人无以告焉。然尝侍九江之末席，闻大贤之余论，谨诵所闻，为二三子言之。二三子之来游，非为学耶？学者，效也。有所不知，效人之所知；有所不能，效人之所能。若已知己能，共知共能，则不必学；不知不能而欲知欲能，故当勉强也。董子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行日起而有功也。”

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热、大黄性凉是也。若名之曰人性必不远，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性善之说，有为而言，荀子性恶之说，有激而发。告子生之谓性，自是确论，与孔子说合，但发之未透，使告子书存，当有可观。王充、荀悦、韩愈即发挥其说，程子、张子、朱子分性为二，有气质，有义理，研辨较精，仍分为二者，盖附会孟子，实则性全是气质，所谓义理自气质出，不得强分也。余别有《论性篇》。）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有性无学，则人与禽兽相等，同是视听运动，无人禽之别也。

学也者，由人为之，勉强至逆者也。不独土石不能，草木不能，禽兽之灵者亦不能也。鸚鵡能言，舞马能舞，不能传授扩充，故无师友之相长，无灵思之相触，故安于其愚，而为人贱弱也。犀象至庞大，人能御之；虎豹鸷猛，人能伏之。惟其任智而

知学也。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故学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独贵于万物也。之京师者，能为燕语；入吴越者，能作吴言；游于贵人之门者，其舆服甚都矣；其外有以灌输之也。终身不出乡，老于山居谷汲者，虽饶衍，朴鄙可笑，蔽其所见而无所学也。况以天地为之居，以万物为之舆，以圣人为之师者乎？

同是物也，人能学则贵，异于万物矣；同是人也，能学则异于常人矣；同是学人也，博学则胜于陋学矣。同是博学，通于宙合，则胜于一方矣；通于百业，则胜于一隅矣。通天人之故，极阴阳之变，则胜于循常蹈故拘文牵义者矣。故人之所以异于人者，在勉强学问而已。夫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顺人之常，有耳目身体，则有声色起居之欲，非逆不能制也；顺人之常，有心思识想，则有私利隘近之患，非逆不能扩也。人之常俗，自贵相贱，人之常境，自善相高，造作论说，制成事业。与接为拘，而目荧惑，而心洽就。其为是俗，非一人也，积千万人、积亿兆人、积京陵秭壤沟人，于是党类立矣。其为是俗，非一时也，积日月年，积百十年，积千万年，于是积习深矣，欲矫然易之，非至逆安能哉！故其逆弥甚者，其学愈至，其远于人愈甚，故所贵勉强行道也。《大戴·保傅篇》曰：“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累数译而不能通。”故孔子曰：“习相远。”习即学也，惟其学相远，故人与禽兽相远，人与人相远，学人与学人相远，其相远之道里，不啻百十里也，不啻千万里也，不啻亿兆里至于无可计议无可知识里也。今譬若尧、舜之与秦政、隋炀，周、孔之与张献忠、李自成，相去之远，巧历岂能算之哉！吾党嚣然操简毕、被章缝而为士人，其得天厚矣，亦勉于学，思以异于常人而已。

然学也者，浩然而博，矫然而异，务逆于常，将何所归乎？

夫所以能学者，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孟子曰：“人者，仁也。”荀子曰：“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董子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自黄帝、尧、舜开物成务，以厚生民，周公、孔子垂学立教，以迪来士，皆以为仁也。旁及异教，佛氏之普度，皆为仁也，故天下未有去仁而能为人者也。虎狼鹰鹯，号称不仁，而未尝食其类，则亦仁也。人莫不爱其身，则知爱父母，其本也，推之天下，其流也，有远近之别耳，其为仁一也。是故其仁小者则为小人，其仁大者则为大人。故孝弟于家者，仁之本也；睦姻于族者，仁之充也；任恤于乡者，仁之广也。若能流惠于邑，则仁大矣；能推恩于国，则仁益远矣；能锡类于天下，仁已至矣。记曰：“凡有血气之物，莫不有知，有知之物，莫不知爱其类。圣人至仁，亦仅能自爱其类，不能及物，为人，亦为我也，所谓仁至义尽也。夫即能仁及天下，亦仅能自爱其类，尽乎人道耳。吾仁亦有所限，方自谦然，岂为高远哉。”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先师朱先生曰：“伯夷之清易，伊尹之任难，故学者学为仁而已，若不行仁，则不为人，且不得为知爱同类之鸟兽，可不耸哉！”

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陆子曰：“学者一人抵当流俗不去，故曾子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朋友讲习，磨励激发，不可寡矣。”顾亭林鉴晚明讲学之弊，乃曰：“今日只当著书，不当讲学。”于是后进沿流，以讲学为大戒。江藩谓“刘台拱言义理而不讲学，所以可取”，其悖谬如此。近世著书，猎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绝无所关。戴震死时，乃曰：“至此平日所读之书，皆不能记，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段玉裁曰：“今日气节坏，政事荒，皆由不讲学之过。”此与王衍之悔清谈无异。故国朝读书之博，风俗之坏，亭林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与二三子剪除荆棘，变易陋习，昌言追孔子讲学之旧，若

其求仁之方，为学之门，当以次告也。

从上圣贤开义甚广，近世儒先学规良多，或有为而言，或因时立教，或便于入门而归宿未精，或偏重一义而该举未备。鄙人深思古义，综约教悖，下学上达，原始要终，尊德道学，由内及外，群言淆乱，则折衷于洙泗之圣，末世昏浊，则上探于三代之英。道器兼包，本末并举，盖皆人道之宜，天理之节，始于为士，终于为圣，由斯道矣，诸子昂哉！

〔说明〕

本文录自《长兴学记》序言部分。1888年，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失败后，深感在当时中国要变法改革，必须制造变法舆论和培养维新人才，因而在1891年，开始在广州长兴里设立学馆，名叫“万木草堂”。

根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是年，康有为“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教中国之法”。康有为提出发展学生德、智、体诸方面的教育思想，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学纲，以“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四门为学目。他同时还提倡“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的治学态度和精神。所谓“逆乎常纬”，实际是对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古文经学（汉学）和宋学进行抨击。万木草堂的教学，标志着康有为正在形成一种有别于封建主义的新颖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

附 录

康有为记万木草堂

光緒十六年（庚寅）三十三岁。

春居徽州会馆，有池石之胜，既而移家羊城之云衢书屋，先曾祖之老屋也。三月陈千秋来见，六月来及吾门。八月梁启超来学。陈通甫又字礼吉，时读书甚多，能考据，以客礼来见，凡三与论诗礼，泛及诸经，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弃考据旧学之无用，礼吉恍然悟，首来受学。语及身世家难，哀感涕下，因以生死之理告之。礼吉超然，蹈道自在矣。凡论今古天下奇伟之说，诸经真伪之故，闻则信而证之。既而告以尧舜三代之文明，皆孔子所托，闻则信而证之。既而告以人生马，马生人，人自猿猴变出，则信而证之。乃告以诸天之界，诸星之界，大地之界，人身之界，血轮之界，各有国土、人民、物类、政教、礼乐、文章，则信而证之。又告以大地界中三世，后此大同之世，复有三统，则信而证之。天才亮特，闻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气刚而力毅，学者之所未见也。……

光緒十七年（辛卯）三十四岁。

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与诸子弟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来学多志士，若韩文举、梁朝杰、曹泰，多有成者，既明而起，讲贯至夜深，又以其暇著书事母，是时精力尚足。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冬，王觉任、麦孟华皆来学。

义乌朱蓉生侍御（一新）时教广雅，来访与辩难颇多，与语中外之变，孔子之大道，朱君不信，既请吾打破后壁言之，乃大悟，其与人言及见之书札，乃其门面语耳。

光绪十八年（壬辰）三十五岁

移讲堂于粤城卫边街邱氏祠，学者渐众，正月龙泽厚以知县引见，道过粤，来学焉。积之仁质甚厚，尝创办广仁善堂，聚众千人，讲袁学诱众，西师李鉴堂礼之，令办乞丐院，又修孔庙者。以陈礼吉充学长，用孔子生二千四百四十三纪年，制大成舞，作歌以祀孔，置干戚以舞大武，歌酌桓赓般六章，复古之礼容焉。与学者习仪礼十七篇，置礼乐器，笙、磬、管、鼓、祝馔皆具，礼必立宾主，器物位置有定，盖太平之意也。……

是时所编辑之书甚多，而《孔子改制考》体裁博大，选同学高才助编纂焉。……

光绪十九年（癸巳）三十六岁。

仍讲学于卫边街，冬迁草堂于府学宫仰高祠，赁之十年，为久计，徐君勉、梁卓如之力也。君勉急朋友之难，常供养朋友之才贤者，以及刻书移草堂之费皆任焉，几以任恤破其家矣。

学者来日众，于时曹泰精思妙悟，徐勤坚苦强毅，以进于成。是岁以梁卓如与陈礼吉充学长焉。旦昼讲学，夕则编书，诸子亦编书焉，书题甚多。……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九岁。

讲学于广府学宫万木草堂，续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学》，使徐君勉、王镜如为学长。……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十一岁。

……（八月）二十二日封万木草堂，以吾所藏及书藏书三百余箱，尽付一炬，……